

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探析:身份政治的视角

王庆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发展。冷战后东亚地区认知结构的变化及中国对东盟规范的内化使中国有了新的身份定位,在这种身份定位指导下的国际实践加深了东盟对中国新身份的重构和认同。中国身份定位的温和与理性及中国自我利益的不断扩大是导致东盟认同中国新身份的重要因素。身份政治理论在给我们提供新视角的同时,其学理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便更好地解释和指导国际实践。

关键词:身份政治;中国—东盟关系;身份建构;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4)02-0028-08

一、身份政治:对外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在对外关系的研究过程中,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着眼点不同,现实主义理论从国际权力的结构研究国家的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侧重从国际制度层面研究国家的行为。事实上,对外政策不仅是一个适应国际体系物质权力结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国内政治意志作用的问题。对外政策还是关于国家的身份、关于一个主权国家所追求和捍卫的核心东西、关于这个国家所推崇并谋求在海外加以传播的各种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政策还是一个与国际体系社会结构有关的问题。^[1]在对国际体系社会结构的相关研究中,身份政治就是一种重视国际体系中社会性因素的说,它假定国家是有意图的行为体,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有理由使用社会理论的拟人概念,如身份、利益、意图等。通过使用这些拟人化了的的概念,使国家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地发挥,并根据国家身份和因身份而具有的利益来考虑其行为选择。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身份政治^①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认为有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

收稿日期:2014-03-16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4CX04018B);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Y120911W)。

作者简介:王庆忠,男,山东郯城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讲师,法学博士。

^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首先把身份的概念引入,并作为分析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内容可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81—292、402—422页。

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身份政治旨在表达一套有关政治实体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2]建构主义超越了单纯对行为的研究,开始从本体论角度对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行深刻地探讨,并根据国家身份和因身份而具有的利益来考虑其行为选择,这是与理性主义学派的根本不同。^[3]因此对国家自身、对别国以及国际体系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社会关系性质等的含义给予确定,通常是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冷战后中国的身份定位及其影响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宣布结束,世界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为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提供了新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与东亚国家的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东亚地区“制度内”、“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所谓“制度内”意味着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创建制度,并按规则行事;“负责任”表明了中国不仅考虑本国的利益,还愿意提供公共物品;“地区大国”强调了中国目前的战略重点在周边,并愿意为推动周边合作负起大国责任。^[4]中国在冷战后新的身份定位是由于以下几点因素造成的。

第一、东亚地区认知结构的变化。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有两条基本的原则:(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5]我们可以看出,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在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看法上,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物质结构,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不仅是一种物质结构,更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且观念结构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卡赞斯坦也提出,“地区不只是世界上存在的物质实体,不只是我们在地图上能直接和准确描绘的有形空间,地区也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和认知结构”。^[6]由此看来,东亚地区结构并非完全是实力分配的结果,同时也是东亚各行为体互动而构成的相互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不仅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因果作用,而且对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也产生建构作用。相互认知结构不同,身份也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利益也发生改变,进而导致行为体的对外政策发生改变。

在冷战时期,世界被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之间形成了彼此敌对的认知结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作为由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东盟也深受这种彼此敌对的认知结构的影响。例如,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中国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建交步伐的姗姗来迟都受到了这种认知结构的深深影响。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以美苏两极为首的敌对的认知结构也逐渐瓦解,从而东亚地区相互对立的态势有所减弱。从总体上来看,东亚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对彼此的积极认知较冷战时期有所加强,东亚的相互认知结构也比以前出现了更加积极的发展态势,这在东盟与中国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冷战结束后相对和谐的东亚地区环境为中国与东盟寻求正向互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例如,在2003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伙伴关系”。面对后冷战时期的环境,中国在与东盟的交往中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定位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也不断受到东盟国家的认可,从而建构了彼此在新时期的利益,这增加了双方对东亚地区的“归属地区认同”,^[7]促使双方在不断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加强合作。

第二、中国对东盟规范的不内化。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与东盟交往的过程中,要不断受到东盟内部相关规范的影响,这种规范调节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同时中国在与东盟交往的过程中

也不断地接受并内化了相关的规范。通过对东盟内部规范的不内化,中国也相应地遵守了东盟所倡导的某些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和平解决争端、互不干涉内政、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等,通过对这些规范的不内化,使中国看到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责任和义务促进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所以,这些规范对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也起到了构成性的作用。

中国作为“10+3”机制的对话伙伴和积极参与者,说明中国已经接受了东盟的相关规范,虽然中、日、韩的物质实力大大超出东盟,但东盟提出规则和设定议事日程的能力却使其权力地位大大超出其自身的物质实力,中国主要通过接受规范参与了东亚地区社会化的进程。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体现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通过协商解决矛盾,二是开展积极的预防外交。通过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表明中国在与东盟互动的过程中接受并且内化了东盟的相关规范,并且愿意按照东盟内部的相关规范行事,这就使东盟能够更加了解中国的行为,增加对中国行动的预期,同时也使东盟对中国制度内、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身份定位更加认同。

三、东盟对中国新身份的建构及形成机理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瓦解,各国开始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随着地区一体化的加快,许多地区内的国家之间纷纷加强了合作,合作与发展的观念已经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观念,成为时代的主流。在这段时期内东盟也重新建构了中国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建构也更符合中国自我的身份定位。

(一) 东盟建构新的中国身份:友好合作伙伴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东盟各自内部的转型使双方在反射评价的逻辑中确定了新的起点。这时候东盟的成员国也扩大到10个,囊括了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东盟成为建构新型东亚秩序的最活跃的因素之一。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从对地区组织的谨慎到最终加入地区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把自己定位于制度内、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这更缓解了东盟对中国这个强大邻居的疑虑,双方的互动开始增多,而这种互动不断增多的结果又更确认了彼此需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东盟对中国在新时期的身份定位有了充分地理解,并相应地把中国建构成能够友好合作的伙伴,这时的双方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和东盟之间才真正进入了扩大交往的新时期,而正是在冷战结束后这段交往的时期内,双方才通过互动的增多而加深了解,把彼此定位于合作伙伴。2003年10月8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说,“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与东盟这两个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加强合作,符合双方当前和长远利益,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是有益的。为此我们一致同意,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8]

(二) 东盟对中国身份建构的形成机理

温特认为一个社会行为可以被分为4段情节,第一情节:自我根据对情景的预设定义开始采取某种行动。第二情节:他者思考自我采取的行动的意义。第三情节:他者根据自己对情景的新的定义,开始采取行动。第四情节:自我解读他者行为,准备作出回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就会相互认知,把原先仅仅是独自占有的知识分配状态变为一种至少是部分共有知识分配状态。^[9]下面我们就根据温特对社会行为的互动分析,来具体解读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演变到部分共有知识分配状态的,从而在这种部分共有知识分配状态下,建构了彼此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一、东盟根据对情景的定义,采取行动发出信号(1991年—1994年)^[10]

随着冷战的终结,国家之间被冷战所固化的认识也逐渐淡化,彼此开始根据国家利益来重新确定彼此的交往。在冷战后期,中国认识到了与周边国家扩大接触而非对峙对本国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东盟国家也认识到了与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对地区发展并没有好处,于是双方都开始采取接触政策,并期待对方给予正面回应。1985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和印尼的僵持关系开始松动。1989年2月23日至25日,钱其琛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钱其琛还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就中国—印尼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会谈,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11]中国试探性地向东盟国家发出了友善的信号。在这种情势下,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东盟顶住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公开表示风波属于中国的内政,采取了接触而非孤立中国的政策。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中国外长出席其外长会议。东盟的这一系列行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包含了一种信号,即东盟接受了中国友善的信号,并表明了其在双方互动过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一个支持中国的角色。

第二、中国解读东盟的行动并作出回应(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接到东盟发出的信号后,开始对东盟的信号进行解读。中国接受了东盟在其危难之时的善意信号,同时中国也看到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国开始对东盟的倡议进行积极的回应。1994年7月,东盟发起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国也成为创始会员国,但是在此阶段,中国虽然参加了ARF,但是总体上比较被动,更由于担心在ARF中受到西方国家的围攻,所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虽然有顾虑,但是仍然多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论坛。1995年—1996年的中美关系因为李登辉访美而出现了困难,同时日美同盟也为干涉两岸关系作准备,而东盟国家并没有卷入其中的争端。相反,东盟利用集体力量将中国、美国及其在亚洲的盟国组织在一起开展年度安全对话,避免冲突升级。^[12]在这一事件中,东盟的表现再一次证明了,对于中国,东盟与美国及其亚洲的盟国有着不同的身份,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东盟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

1997年,东南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在东盟国家的经济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许多亚洲邻国纷纷宣布本国的货币贬值,而这又使东盟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在面对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中国充分显示了自己是地区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宣布本国的货币不贬值,并且给予东盟以积极的援助和大量的贷款,这对东盟国家战胜危机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舞。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加深了彼此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东盟对中国在新世纪的身份定位给与了理解和支持。

第三、东盟根据新的情景开始采取行动(1997年—2000年)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危机中的负责表现,使东盟国家看到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东盟积极倡议召开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定期会议,以便共同协商解决地区内的问题。1997年12月东盟+3对话机制建立后,中国是该机制的积极倡导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认为,“东盟迄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是10+3会议的组织和协调者,这既是东亚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妥善安排。”^[13]中国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中国已经接受了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1997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4]并且从1997年以后每年举行一次东盟与中国首脑会晤,中国与东盟的高层会晤对于推动双边关系,增进双方信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和东盟对话机制和首脑会晤机制的建立说明中国已经不再对东盟抱有疑虑。自此,东盟和中国的合作与往来不断加大,可以

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相互积极主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巩固了双方对彼此身份的认识。但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动并不是都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有时候的互动并不能促使双方的观点达成一致。例如,1997年中国外交官和军方官员代表团对亚洲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呼吁废除同盟体系,中国呼吁废除的同盟关系既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双边和三边同盟体系也包括多边同盟体系,^[15]但是东盟国家在接到这样的信号后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回应,并表示无意结束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关系,这种反馈应该说是中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中国在接受到东盟的反馈后,对东盟的做法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接受了美国作为一支平衡力量在东亚的存在。

第四、双方反复的互动,使双方共享了部分共有观念,这又促进了彼此合作的发展(2000年至今)

东盟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互动使东盟习得并内化了中国新的身份,中国和东盟从相互敌视到逐渐接触再到合作关系的确立是在双方不断的互动中实现的。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并非是简单的个体,它同时携带着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的全部规范和观念,因此,中国与东盟的互动也是与一种地区组织规范的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中国不仅习得了这种地区组织的相关规范,而且内化了东盟相关的规范,这种规范也就相应地建构了中国新的身份和利益。例如,冷战结束后在中国和东盟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接受东盟制定的相关规范,并且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这些规范和条约的内化,促使中国要做一个制度内、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这也就相应地建构了中国新的身份。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各方希望通过政治文件来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对中国与东盟增进彼此之间的互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东盟之间长期的互动与磨合,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部分的共有观念,那就是:中国和东盟要共同致力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以适应不断兴起的地区合作潮流。在这种共有观念的指导下,双方为促进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合作历程。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后的互动过程中,中国和东盟都习得了冷战后东亚新型地区主义观念。东盟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地区组织在冷战后积极与中国接触,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开始逐步向中国传递地区主义观念,中国通过社会学习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地区合作的观念,东盟坚持邀请中国参加各种多边机制,为中国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中国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反馈东盟的信号传递,也改变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传统态度,使东盟国家了解了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外交战略及中国作为地区内负责任大国和友善的一面。温特说:“如果一方由于对方的行为而修正了自己的观念,那么就出现了习得现象”。^[16]很明显,在中国与东盟的互动过程中双方都因为对方的行为而修正了自己的观念,接受了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东盟也认识到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可以说双方都习得了一种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新型的地区主义观念,即双方彼此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和东盟在冷战结束后的互动使彼此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共有观念,并且认为推动地区合作和发展是双方利益的一部分,在这种共有观念的支撑下,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是这种共有观念仍然是相对薄弱的,一旦涉及到主权敏感的问题时,彼此的关系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观察双方关系时必须注意的。

四、推动东盟建构中国新身份的因素

在新时期,中国的身份定位更加温和与理性,把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看成是本国的一种利益,并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中国的这种行为使东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并认为中国正在逐渐成长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对双方和地区发展都是有利的。

具体来说,东盟对中国“友好合作伙伴”身份的建构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 中国的身份定位更加温和与理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也在不断定位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的不断定位促使中国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也就导致了自己国际行为和对外政策的不断变化。对比中国在冷战时期的身份和冷战后的身份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更加理性和温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从国际社会的“挑战者”转换成现存国际社会的适应者。中国的第一次身份定位,是按照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身份定位使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交往,并且中国认为要想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此,中国把自己确定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积极向周边的国家输出革命,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可以看出,这种身份定位是基于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特征的总体判断。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十分有限地参与到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但是这时中国已经开始学习如何适应国际体系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中国认识到,要想发展是不能不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机制的,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到能够彻底推翻现存的国际体系,而且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巨大吸引力的文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而仍然是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将会延续下去。^[17]所以,中国积极地融入了国际社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其次,中国从国际机制的“革命者”转变成现存国际机制的改革者。新中国成立后,把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国际机制看成是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因此希望打破这种国际机制,对于中国来说,东盟的成立也是资本主义阵营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时逐渐认识到,虽然现存的国际机制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对于维护世界的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维护现存的国际机制符合中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现存的国际机制给中国的发展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获益者。但是现存国际机制也有一些弊端,因此需要对其加以改革,以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机制,使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获益。中国的主张也得到了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赞同,中国和东盟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机制上也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中国对国际机制态度的改变也增加了东盟和中国之间的理解,为双方在国际上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最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身份定位,使中国转变成了负责任的、地区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曾是一个专注于内部事务的国家,冷战期间,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对周边国家和全球事务尤其是与中国无关的国际事务基本上不予关注,即使对一些国际事务有所关注,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防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国家利益在国际上的不断拓展,中国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安全不完全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发展和政策,它与外部环境也直接相关。因此中国要积极参加本地区的建设,为此,中国在与东盟的交往过程中,不断给予东盟国家以援助,积极促进双方的各方面交流,通过援助和促进区域合作向周边国家表达善意,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将是机遇而非威胁,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自信、和平、合作的形象。同时,中国尽可能成为更多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成员,借此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广泛的承认和权利,履行更多的责任和义务。^[18]今天,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对周边国家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成为地区内负责任的大国。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在身份变迁过程中对自身的身份定位不断趋于温和与理性,这种更加温和与理性的身份定位对于东盟对中国“友好合作伙伴”身份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中国自我利益的不断扩大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利益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在互动过程中行为体建构了彼此的身份,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玛莎·费丽莫认为,“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等着去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19] 国家在互动实践中,随着国际进程的不断发展和重塑国家身份,并据此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20]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及其战略相处国的身份,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对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占主导地位,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处于次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立自主的行为体”的身份定位,使得中国在对外的交往中,可以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占主导的对外交往方式,把国家的经济利益提高到显著的位置。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把自己定位于“制度内、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这种身份定位再一次扩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包含传统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更为重要的是,还包括了“责任利益”。“作为在现存体系中地位正在上升的、并在体系中获益的大国,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需求,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忆,更与发展利益相关。这不仅是中国责任之所在,也是利益之所在。”^[21] 这种“责任利益”,要求中国把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为自己的责任,为地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地区内国家遇到困难时中国要积极提供援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大海啸中,中国就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责任利益。中国自我利益的不断扩大,促使中国把维护地区发展与稳定作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这也不断影响着东盟对中国“友好合作伙伴”身份的建构。

五、结论及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从身份政治的视角探讨对外关系,是近年来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这有利于打破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使国家在对外交往中注意彼此的身份建构,并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待不同身份的国家,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有学者指出,建构主义者的著述通过强调身份和规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观点来认识东盟,这种观点认为身份和规范不仅导致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秩序,而且它们具有改造的潜力,这是现实主义者所没有预料的。^[22] 虽然身份政治在解释一些国际现象时能给我们提供新的视角,但是它的解释力也并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我们不断从学理上丰富它的内容。例如,国家身份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什么? 有些国家在定位自己的身份时虽然已经很积极了,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与它交往中还是有所顾忌。例如中国在冷战后的身份定位是“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还是不断煽动“中国威胁论”? 东盟的个别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为什么仍然视中国为“威胁者”? 身份政治的解释力到底能有多强? 它与权力政治相比有那些优点和不足? 这些都是我们要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身份政治的视角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实践过程中对赤裸裸的权力政治有所收敛,从而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注意自己的国家身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注释:

[1] 刘永涛:《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国际观察》2005 年第 5 期。

[2][5][9][1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年,第 282、1、416、

416 页。

- [3]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 [4] 姜运仓:《东亚经济合作中的身份建构》,《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第63页。
- [6]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 354.
- [7] 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19页。
- [8] 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 [10] 薛晓芑:《中国对东亚地区主义观念的转变》,《外交评论》2006年6月,第30页。
- [11]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 [12] Allen S. Whiting, "ASEAN Eyes China", *Asian Survey*, vol. 37, no. 4 (April 1997).
- [13] 查道炯:《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第13—14页。
- [14] 张金荣:《试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的动因》,《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第15页。
- [15]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 24.
- [17] 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22页。
- [18] 程又中:《对“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阐释》,《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第41页。
- [19]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 [20] 孙溯源:《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41页。
- [21] 周海生:《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4期,第63—64页。
- [22] Helen E. S. Nesadurai, "ASE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After the Cold War: From Regional Order to Regional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2, No. 1 (March 2009), p. 97.

[责任编辑:伊 玛]

China-ASEAN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Politics

WANG Qing-zho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Shandong)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ASEAN relations have been a great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China has a new identity because of cognitiv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ast Asia in Post-Cold War and China internalized ASEAN norms. The new identity under international practice has deepened ASEAN reconstru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hina's new identity. Chinese moderate identity and rational self-interest of expanding lead to the identity of the ASEAN China's new identity. The identity of political theor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explain and guide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Key words: identity politics, China-ASEAN relations,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formation mechanism